第一章　御侮怒潮

在八闽大地上流淌了万千年的闽江，日日夜夜之间，潮起潮落，勇往直前地奔流不息。她给予福建人民以甘甜的乳汁和伟大的力量，是一条饱经风霜、慈祥而又坚强的母亲河。

19 世纪 30 年代，当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还停留在封建社会晚期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已处于急剧地膨胀上升的发展阶段。1840 年，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42 年，中国在这场罪恶的战争中失败了，中华民族遭受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悲惨命运从此开了头。

战后，根据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1843 年 11 月和 1844 年 7 月，福州、厦门先后正式开埠“通商”。此后，美国、法国以及沙皇俄国、日本、德国、荷兰、西班牙等资本主义国家也接踵而来。从此，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以福州、厦门为跳板，逐渐深入福建各地。

但是，福建人民富有反侵略的光荣传统，绝不甘心屈服于列强的压迫之下。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初，福建人民就开始不屈不挠地掀起了反对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内的反侵略斗争。由于福建曾经被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因此，这些反侵略斗争中，尤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最为突出。自近代以来直到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福建人民的反日爱国斗争正如亘古流淌的闽江，尽管总是潮起潮落，却永远奔流不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福建人民早期的反日爱国斗争

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明治维新”时期便确立了对外扩张政策。明治天皇公开主张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从这种狂妄的野心出发，口本制定了征服中国和世界的大陆政策，即第一期征服我国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我国东北，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按照这个侵略步骤，日本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就不断入侵朝鲜和我国台湾。1887 年,日本制订了详细的《征讨清国策》,提出了‘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的侵华计划，叫嚷要对中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冒险战争。到 90 年代初，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 63 000 名常备兵和 23 万名预备兵的陆军，并拥有排水量六万吨的海军舰只。1890 年，日本资本主义发生了经济危机，国内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日本政府为了摆脱困境，决计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1894 年 7 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战争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1895 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

甲午战后，日本侵占了台湾。帝国主义各国效法日本，纷纷在中国夺占势力范围，而日本则以台湾为基地加紧了侵略福建的步伐。1896 年 7 月,日本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通商行船条约》，该约允许日本在上海、天津、厦门、汉口等地设立“专管租界”;1898 年 4 月 22 日，日本侵略者又强迫清政府承认福建划为它的势力范围。

在此前后，由于《马关条约》允许日本在中国各地投资办厂，干

是，日本的资本开始大举涌入福建，进一步在福建各地创办工厂、设立银行，以资本输出的形式加紧了对福建的经济侵略。日本商人先后在福州、厦门等地开办了玻璃厂(主要制造煤油灯灯罩)、制冰厂、樟油厂、印刷厂、电话公司、轮船公司等。日本资本还跻身于福建的航运业，且发展十分迅速。以厦门为例，日本大阪轮船株式会社在厦门设立分驻机构后，主要经营日、台人的客、货运输，一线航行于厦门、台湾、日本之间；一线航行于厦门、香港之间，另外还有许多不定期的货船往来。为了便利日、台商人走单帮和走私活动，还有“广东丸”、“香港丸”航行于日本、香港、基隆、汕头、厦门等地，每星期各对开一次。在甲午战后的短短时间内，即已夺占了厦门外国轮船往来数量的 23%。日本在福建投资办厂，利用福建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制造产品就地倾销或转口他销，获取了比向福建输出商品高得多的利润，从而与其他外国资本一起严重阻碍了福建民族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造成了福建工人的失业，加剧了福建社会经济的凋敝。

甲午战后，日本于 1899 年在台北成立了台湾银行。随后，即于 1901 年在厦门设立分行，1905 年在福州设立分行；1907 年，又在厦门设立了新高银行。日资银行同其他外国银行一样，大量吸收私人存款，特别是官僚、地主、富商、军阀的存款，还有侨汇和国家贸易、工程上的来往款项，数额巨大。如富豪林尔康在主持厦门保商局时，就把价值 40 万元的足赤金叶（标准金）存入厦门台湾银行，该行乃以此为准备金，大量发行纸币。台湾银行将吸收到的资金，主要用于对日、台商行等办理押汇和放款业务，帮助日、台商行进行经济掠夺。如日本三井洋行所需流动资金都是由台湾银行借给的。当时有一个台湾人康守仁在厦门囤积了大量鸦片，其资金也是台湾银行借给的。此外，日资台湾银行还在福建积极筹划建设铁路和开采煤矿等，企图进一步掌握福建的经济命脉。

日本侵略者在进行资本输出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商品倾销和资源掠夺。甲午战后，福建大量进口的洋货以日货的增长最引人注目。1892 年仅进口一担日本纱，而 1901 年已增至 4 388 担；日本火柴在 1892 年至 1898 年间，几乎完全取代其他各种火柴，1898 年福建进口日本火柴多达 236 964 箩。1901 年间，仅从三都澳输入的日本煤油就多达 10 万加仑。关于资源掠夺，以樟脑为例：1902 年以后，日商、英商等争相在闽江上游各地采办樟脑，致使价格上涨，山区民众争相采伐樟树。1907 年，福建输出樟脑的价值高达 260 万元。而大量砍伐的结果，福建的樟树资源很快濒于枯竭。

日本侵略者还积极进行文化侵略。甲午战后，日本人在福州创办了“东文学社”，在厦门开办了“东亚书院”等学校；同时，先后在福州创办了《闽报》、在厦门创办了《全闽新日报》；而日本的佛教西本愿寺派和净土真宗大谷派也先后到厦门等地开教。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深入的侵略，福建人民掀起坚决的反日爱国斗争，其中以厦门人民坚决反对日本强占虎头山为租界的斗争最为突出。

早在甲午战争以前，日本侵略者就看中了厦门，对厦门进行过一系列的侵略活动。1874 年，日本政府曾经派遣军舰以所谓的“借地操兵”为理由，前来厦门，刺探港湾地势。接着，又有日轮“孟春号”到厦门海面测水，清地方当局不敢干涉，只是命令守军“严密备御”。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中将伊东祐亨派军舰到广东、福建进行侵略活动时，就首先到达厦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曾经秘密来过厦门，亲自策划对厦门的侵略。

1897 年，日本政府根据与清政府签订的《通商行船条约》中关于允许日本在厦门设立“专管租界”的条款，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将厦门城外的草仔垵、沙坡头和它们中间沿海岸一带以及嵩屿、大屿内对着鼓浪屿的沿海岸一带，共 22 万坪划为日本“专管租界”。清

总理衙门惟命是从，即指令闽浙总督和福州将军着手绘制地图，准备予以划界。但是，由于厦门人民的反对，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想把这一带划为自己的租界，所以，清政府一时无法实行划界。1898 年，清政府被迫承认福建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后，日本侵略者要在厦门划立“专管租界”的野心更加强烈。1899 年 1 月，新任兴泉永道道台恽祖祁到任。日本驻厦门领事上野专一就迫不及待地要求与之商讨“会办划界要务”，提出改将从沙坡头海岸(即民船寄碇之处)起，包括背后一带山岭，沿海岸直至瑞记洋行止，以及从鼓浪屿纱帽石山起，陆地以外，海面务从宽阔，预备将来填筑至五个牌止，这两处都划为日本的租界。厦门绅民对日本侵略者强索租界的行径十分愤恨，纷纷上书恽祖祁，指出厦门港居民稠密，特别是渔民居多，每当遇到台风时，渔船、驳船都在沙坡内港避风，沙坡头一带“实为要处”，不能划为日本的租界。并表示如果政府应允日本人在这里划定租界，当地居民数千人“势必相率阻挠”，希望恽祖祁为民请命，力保国家主权。恽祖祁是个有骨气的爱国者，他对群众表示说：“国土可保，则身留，不保则身去。吾志已决，不忍见寸土让人也。”闽浙总督一再催促恽祖祁，从速按照总理衙门的指示筹划日本租界。但恽祖祁在厦门人民爱国热诚的鼓舞下，尽力与日本侵略者周旋，拖延不予划界。他一方面向闽浙总督提出：“厦门各处行栈、居民、坟墓稠密，实无隙地”，可划为日本租界，若将民居、民坟划入日本租界，则难保当地百姓不起来闹事反对，同时也要设法防止其他列强“继起效尤”；另一方面在和日本驻厦领事交涉过程中，他警告说：“日本人在厦门通商，如果不得民心，中国政府又怎能保护你们？”同时，还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厦门的矛盾，对日本人进行牵制。几经较量，日本驻厦领事作了让步，改为仅仅要求在虎头山一带划地四万坪作为租界。但恽祖祁认为虎头山是厦门港口要隘，涉及国防安全，坚持不允。于是，日本驻厦领事通过日本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华公使向清总理衙门施压，要求撤去恽祖祁兴泉永道道台的官职。总理衙门再次严令恽祖祁立即会同日本驻厦领事“及早划界”。5月,厦门人民得悉消息,纷纷集会向恽祖祁请愿,要求“免拨租界”。7月24日至25日，厦门人民更举行罢市以示抗议。恽祖祁得到厦门人民的支持，继续坚持不予日本划界的立场，并向闽浙总督表示“誓与虎头山同去就”。不久,清政府决定罢免恽祖祁。恽祖祁得知后立即辞官而去。为此，闽浙总督改派福建布政使周莲到厦门执行划界。

周莲到厦门后，即与日本驻厦领事商定了划界范围，并匆忙决定于8月22日办理划界,以免夜长梦多。但由于是日大雨滂沱,不得不改在23日执行。

8月23日上午，厦门地方官吏会同日本驻厦领事等来到虎头山，立即被厦门群众团团围住，怒不可遏的男女老少以石头、砖块、木棍为武器，痛打日本侵略者，有的妇女还以扫帚蘸了粪便甩向日本人，厦门地方官吏也被痛打一顿。卖国官吏和日本人只好仓皇逃命。愤怒的群众随即又包围了周莲的住处，迫使他当众表示不执行划界。随后几天,厦门全岛商店罢市、船工罢海,强烈抗议日本强索虎头山为租界。在厦门人民坚持不懈的反对之下，日本侵略者在厦门设立租界的企图，最终没能得逞。

但是，日本侵略者并不死心，反而阴谋独占厦门。1900年,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闽南各地接连发生驱逐教士、拆毁教堂的反洋教事件,各地的外国教士和侨民纷纷来厦门“避难”,帝国主义国家以保护侨民为名，纷纷派军舰进入厦门港。日本侵略者也想趁此机会出兵独占厦门。8月24日，日本驻厦领事唆使日本僧侣纵火焚毁了山仔顶的“东本愿寺”。日本侵略者以此为借口派海军陆战队在厦门登陆，并在虎头山架起大炮。但厦门人民仍然奋起反抗，厦门胡里山炮台的清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也把大炮对准了鼓

浪屿的日本领事馆，准备开战。后来，由于各国驻厦领事从各自的侵略利益出发，不愿意看到日本独占厦门，相继向日本施加压力，日军不得不在 9 月 9 日撤出了厦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趁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之机独占中国。1915 年，日本政府以武力相威胁，迫使袁世凯政府全部接受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并提出日本政府将按照既定的侵华方针，在独占山东、进一步侵略满洲南部、内蒙东部的同时，要确保福建作为日本势力范围与日本的特殊关系，并努力扶植在福建的侵略势力。在这以后，日本侵略者在福建各地十分嚣张。上海《民国日报》惊呼‘日人在福州势力之大，与行动之不法，已达极点’‘完全漠视中国政府’。

面对日本侵略势力的日益扩张和北洋政府日益投靠日本，福建人民深感民族危机的深重，于是，同全国人民一道奋起斗争，强烈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卖国。1915 年 5 月，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福建，福州、厦门、龙岩、泉州、连江等地都爆发了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风潮。人民群众在青年学生的带动下，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和游行，组织各种爱国团体，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此外，在福、厦等大城市求学的学生，还纷纷返回家乡，深入到农村开展抵制日货运动。1916 年 11 月 15 日，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在厦门梧桐埕七号，设立‘大日本驻厦门警察所’，在厦门行使警察权。厦门人民强烈反对日本侵略者这一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向日本政府严重交涉。1918 年 5 月，留日的中国学生为反对‘西原借款’和《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东京举行示威游行，遭到日本政府的迫害。于是，福建留日学生纷纷罢课回国，组织爱国反日团体，进行反对日本侵略的宣传。福州等地的爱国学生和各界群众也举行了游行示威，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

定》和‘二十一条”。所有这些斗争活动,虽然都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但有力地遏制了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建的侵略行径。

“五·四”反日爱国斗争的蓬勃兴起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奥地利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结束。1919年1月18日,27个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陆徵祥、顾维钧等五人作为全权代表出席会议。但是,会议被美、英、法、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所操纵,成为它们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会议。

中国代表向会议要求将德国原在山东的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其全部权益直接归还中国,同时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并提出废除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撤销外国邮局及其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七项‘希望条件”。但是,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幕后可耻交易之下,会议从1月至4月,虽几经讨论,然而最终公然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却同意将德国原在山东的侵略权益全部让予日本;而卖国无能的北京政府竟然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予以承认,直接表明了在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和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下,中国外交的惨败。消息传到北京,北京学生于5月4日掀起了要求拒绝签约的反帝爱国运动。

灾难深重的福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本来就十分尖锐。因此,“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惨败一下子点燃了福建人民胸中反帝反封建的怒火。5月6日,福州协和大学、省立三中、私立法政学

校、福州师范学校、华侨中学等校学生接获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通电，立即连夜互相联络，并在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紧急会议，经商议决定响应北京学生的通电，于 5 月 7 日实行罢课，举行全市各校学生的示威游行。随后，与会的各校学生连夜回校召集同学进行准备。翌日晨，福州中等以上各校学生全部聚集在福州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和约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北京学生”，并呼吁福建人民抵制日货。会后，与会全体学生手执小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从城内出发，直达各国驻福州领事馆所在地仓前山，并在日本领事馆前张贴标语、高呼口号，进行示威。接着，游行队伍又从仓前山返回城内，到福建督军衙门请愿，要求福建地方当局立即转电北京政府，要求尊重全国民意，以民意为后盾执行强硬外交。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被迫派人接见学生，并同意向北京政府转陈福州学生的要求。 5 月 8 日，旅京全闽学生会通电省内商学农工各界及全省机关团体，呼吁团结一致，力争山东问题的圆满解决。5 月中旬，为了进一步开展反日爱国斗争，福州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在福州城内吉庇巷谢氏祠堂召开“福建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一丰、谢翔高为正、副干事长的福建学生联合会。福建学联会成立之后，立即就通电上海各大报馆，主张力争外交、惩办国贼，并号召全省各县的学生采取一致的行动，奋起响应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不久，福建学联会又创办了会刊《全闽学生日刊》，积极进行反日爱国宣传。在学生爱国热情的影响下，5 月 11 日，福建省议会也致电北京政府，要求体察舆情，严饬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

此后，福州的反日爱国斗争进一步发展。5 月 23 日，福州“青年会”学校学生在街头宣传反日爱国，呼吁全市各界奋起以实际行动救国，竟遭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行凶殴打，学生重伤七八人。当天

下午，福建学生联合会决定联合各界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进行抗议,并在公共体育场举行追悼‘五·四’殉难烈士、旅京广东籍学生郭钦光大会。军阀当局侦知这一消息后，督军李厚基就紧急召见福州 13所中等以上学校校长，要求制止学生的集会游行，并扬言否则要以武力加以制止。各校校长认为，正当五四运动席卷全国之际,群情汹涌,如果强行制止,可能引起民众的更大愤慨。李厚基考虑之后，表面上允许学生游行，仅要求各校限制学生行动，游行队伍不得出城到日本领事馆示威，手执小旗不得书写“妨碍邦交”的偏激字样。然而，翌日清晨，军阀当局还是派出大批军警封锁了各主要学校，禁止学生走出校门；公共体育场四周也布满了大批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驱赶行人,不准通行。这时,正准备召集各校学生行动的学联会负责人毛一丰，急忙就近在某一私人住宅借用电话，通知各校将集会地址改到西湖公园。于是，各校学生避过军警，越墙而出。当数千名学生到达西湖公园门口时，他们发现这里也有大批军警严密把守大门，不让学生入内集会。学生们饱含热泪，向军警进行爱国宣传，并英勇地冲开了军警的封锁，进入西湖公园内召开大会。会后,来自全市 42所学校的学生分成 32 队上街游行,并不顾军阀当局的禁令，游行队伍直抵仓前山日本领事馆进行示威，然后返回城内的南公园烈士祠方行散去。福州各校学生的爱国行动受到各界群众的支持，游行队伍经过的街道，各商店都备有茶水让学生饮用；各个小学的学生由于年龄太小不能参加游行，但也都聚集在道路两旁,高呼口号、鸣放鞭炮,为游行队伍助威。这次集会和游行示威影响很大,新闻界称‘八闽气象,为之一壮”,高度评价了福州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厦门,5 月中旬，爱国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庄希泉、吴梓人等在厦门报刊上发表文章，号召厦门人民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反帝斗争。5月 15 日,厦门同文书院、省立第十三中学等各

校学生分别在校内集会，表示誓死力争山东利权；16 日，厦门和鼓浪屿学生 4 000 余人上街示威游行。沿途散发各种传单、宣言书、演说词，高呼“急起救国”“还我青岛”“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队伍路过日本“三井洋行”时，愤怒的学生和群众拿起石头砸了洋行的门窗玻璃。17 日，厦门钱庄公会决定从当日起不收兑日资台湾银行、新高银行发行的钞票等，厦门市民争相持票到这两家银行要求兑现。18日，由厦门商会、教育会、学生联合会、工人等各界代表组织成立了“厦门国民大会干事部”，随即以该干事部的名义发表了“抵制日货、实行经济绝交”的通告，号召厦门各界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抵制日货，拒用日币。20 日，厦门国民大会在同文书院操场召开，到会者计两万余人。各界代表相继上台演说后，会议致电北京政府、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各国驻北京公使馆以及国内外的新闻团体，呼吁拒绝“巴黎和约”签字，表示了为保卫青岛，斗争到底的决心。正当厦门人民反日爱国斗争日益高涨之际，日本政府派遣“千岁”和“岩手”两艘军舰进入厦门港，进行武装恫吓。日本驻厦门领事还胁迫厦门地方当局发布告示，禁止人民群众的反日爱国行动。但是，厦门人民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进一步激起了更大的愤慨，反日爱国斗争更加深入发展。自 5 月下旬开始，厦门的码头工人拒绝为日本商船卸货，致使由香港运往厦门的货物几乎都不要日船运输。

在漳州，5 月 17 日，漳州省立第八中学、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等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每人手执小旗，上面书写着“誓死力争”“勿作五分钟爱国”“争回青岛方罢休”“共伸天讨”“诛灭卖国贼”等种种激愤的字句。学生们沿途高唱“国耻歌”，并散发《哀求同胞一致对倭文》。当游行队伍行至龙溪总商会门前时，学生代表要求面见商会会长，请求商会积极抵制日货，并联合漳州各界筹办国民大会，做政府的外交后盾。龙溪总商会当即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通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要求拒绝‘和约’签字。最后,游行队伍聚集在漳州公园内，学生代表吕隆庆等向群众演说，说到愤慨悲切之处，吕隆庆失声大哭，整个演说长达四小时之久，自发汇聚而来的听众一万余人，久久不散，群情激愤。5 月 22 日,漳州各界人士一万余人，又聚集在漳州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大会通过决议，致电巴黎和会及与会的中国代表,要求争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及各种不平等条约；要求政府惩办卖国贼；并决定在漳州实行抵制日货。会后，一万余人再次举行了示威游行。

在泉州,由于旅京泉籍学生魏峥峨等人,在 5 月 4 日当天积极参加了天安门的学生集会和示威游行，并在游行过程中被反动军警枪击负伤，泉州各界群众接获消息后，群情激愤。5 月 21 日,由泉州私立中学发起,培元中学、省立中学以及晋江县高小、振兴、佩实、西隅等校师生 2 000 余人，冒雨举行了声援北京学生的大会。会后集队游行,师生们沿途分发传单,高唱‘五九国耻歌’,队伍经过义全后街时，群众正在演地方戏，学生们便请求暂时停演，并登台向群众演讲,女学生黄廷英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群众莫不为之感动。此后，泉州各校学生选派代表成立了泉州学生联合会，并联合各界积极筹备召开国民大会，以进一步唤起民众响应反日爱国斗争。

在莆田,5 月 29 日，由莆田省立第十中学学生发起，会集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哲理中学等中、小学校师生 1 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

在闽西，连城县立中学学生接获省内外的五四运动消息后，在爱国教师何其伟的率领下，立即组织宣传队到街头和城郊各处演讲；同时联络附城各小学师生 1 000 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并在沿途经过的洋货店，抄出日货加以焚毁。不久，又召开学生联合大会,通电全国,申明连城人民积极斗争,以争回青岛、惩办卖国

贼的决心。长汀的青年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于 5月 30 日召开汀州国民大会,通电北京政府和广东军政府,要求“誓不签约”“抵制日货”“取消二十一条”省立七中等校学生还相继举行罢课,捣毁帝国主义在长汀创办的教会学校。

在闽北，浦城县立高等小学师生接到福州和上海学生联合会寄来的传单，得悉省内外五四运动的消息，也立即发起组织浦城县学生联合会，连夜油印传单，在全县城乡张贴，并组织宣传队到处进行演讲，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学生联合会还组织各校学生在县公共体育场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消息传到邵武，邵武学生联合会即发动汉美中学、乐德女中、省立第六中学等中小学校师生 1 000余人，在县城南门大校场集会，各校学生代表争相上台演讲,要求“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签和约”,会后还举行了示威游行。建瓯也随即成立了县学生联合会，省立第五中学学生杨峻德等学联会负责人领导各校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学生宣传队日夜在街头向群众宣传演讲“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道理，呼吁各界群众奋起反日救国。

在此前后,闽东的福安、霞浦、罗源、连江、古田、福鼎等县学生，为了响应五四运动也都相继成立了县学生联合会，组织爱国青年学生走出课堂，在城乡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政府卖国，呼吁抵制日货。

5月底 6月初，五四运动的反日爱国怒火已经从北京燃遍了全国各地，燃遍了福建的城市和乡村。

但是，北京军阀政府为了扼杀人民群众的反日爱国斗争，自 6月 3 日起，派出大批军警在北京街头镇压进行集会和演讲的爱国学生,并实行大逮捕,前后被捕学生达 700 多人。北京政府的大逮捕，不仅没有把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镇压下去，反而进一步激怒人民群众掀起更广泛的反日爱国斗争的风暴。6 月 5 日,上海开始工

人罢工、学生罢课、商民罢市。上海的“三罢”斗争,尤其是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极大地震动了全国人民。

在上海和北京反日爱国斗争的影响下，福建人民开展了更深入的斗争。6 月 5 日，厦门国民大会干事部接到北京、上海来电，当晚即将北京政府大肆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并要求厦门各界从翌日（6 日）起开始实行罢工、罢课、罢市,直至被捕学生获释为止。6 月晨,厦门实现罢市、罢课。上午 11 时,厦门军政当局派出人员到处劝告开市，但各家商店都置之不理。 7 日,厦门商务总会迫于军阀当局的压力，召开全体商人大会，劝说开市。但多数商店加以抵制，罢市如故。此外，厦门码头工人则坚持不为日船卸货。除厦门外，福州等地的反日爱国运动则从此转为广泛、持久、深入的抵制日货运动。

福建各地的爱国学生以自己满腔的爱国激情，唤起了各界民众,从而把自 1915 年反对“二十一条”以来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并迅即汇入了全国五四运动波澜壮阔的斗争洪流。

波及全国的福州“台江事件”

1919年，早在福建全省各地的爱国学生纷纷奋起响应五四运动之初，学生们就积极联合社会各界实行抵制日货。福州学生成立“福建学生联合会”时,就在学联会内设立了“日货调查部”厦门、漳州、泉州以及全省其他较大的城镇，爱国学生都组织成立了“国货维持会”、“日货检查队”、“反日会”、“救国会”等团体,积极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有的地方对市面上的日货作周密的调查，对各商行

的货物进行认真的盘查鉴别，确系日货的登记在册，听候处理，并不准再进日货；有的地方在抵制日货的传单上，列明各种日货的商品、商标名称，劝告群众不要购买使用；更多的地方挨店抄查日货，并将之聚集在一处加以焚毁。一时之间，抵制日货运动遍及全省各大城镇。进入 7 月，各地学校开始放暑假。各县在福、厦、漳、泉以及邵武、建瓯、龙岩、长汀、莆田等各校求学的学生，都陆续返回家乡。在各地学生联合会的组织领导下，这些学生又把抵制日货运动推广到了广大的农村。于是，焚烧日货的烈火很快燃遍了全省广大的穷乡僻壤，“虽妇人小子亦知排斥日货”，使日货在各地“再无生存之余地”。

随着抵制日货运动的深入，福建许多地方还陆续发起组织了抵制日货的“五人团”。这种“五人团”不拘于学生参加，凡是热心爱国的人都可以加入。“五人团”以倡用国货、力排日货为宗旨，五人互相监督，违者受罚，并责成团友除自己守则之外，还要担负起劝告亲戚朋友的责任。这一新的团体形式的出现，使福建人民的抵制日货运动真正从学界扩展到了社会各界，并日益成为各界群众的自觉行动。

福建人民广泛、深入的抵制日货运动，旷日持久，勇猛激烈，成为福建五四爱国斗争的一大特点。不但各地各商家经营的日货被抄出焚毁，各地拒绝学生查检的日货代理商店被捣毁，甚至连日商开办的工厂和商行，也被捣毁或因群众的抵制而倒闭。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建的侵略势力因此遭到了极为沉重的打击，就连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也不得不哀叹：“闽人仇日最烈，屡焚日货，侨商损失甚巨。”

福建人民抵制日货运动在五四运动中的突出地位，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十分仇恨。日本政府一方面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取缔抵制日货运动。另一方面则处心积虑地准备“以福州为发难

之点”,制造事端,妄图破坏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1919 年 11 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挑选了台湾的罪犯 80 余人,送到福州,由日本驻闽总领事馆组织成“敢死团”,让他们伺机挑起事端,以便‘将功赎罪’。日本总领事馆从台湾银行拨款 3 000 元作为经费,规定如因此丧命,除向中国政府交涉赔款外,并给予 1 000 元抚恤费;并命令日人开设的博济医院预备绷带伤药等分给敢死团员备用。11 月 12 日,日本总领事馆捏造所谓福州日商瑞顺洋行在运输火柴(两箱)经过中洲时,被学生包围,并强迫挑夫运往大庙山焚毁的“事实”,由日籍台湾人写成新闻稿投寄福州各报馆。福州《求是报》一时失察,先是予以登载,旋即查证无此事实,又登报更正。但日本总领事馆则强行引为证据,向福建地方政府提出逮捕处罚‘暴行学生’,赔偿‘被害者’经济损失,以及福建地方政府必须确保学生不再犯类似‘暴行’等无理要求。并且声言说,在福州的日本臣民对这事‘忿怒已甚’,将来如果再有学生不法行为,激起冲突,造成流血事件发生,责任不在日本领事馆,而在福建政府,因为是福建政府取缔排日团不力,才会产生学生的不法行为。日本总领事馆的声明为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福州蓄意制造事端作了舆论的准备。

11 月 16 日下午,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纠集了“敢死团”60 人,携带刀棍手枪等武器,由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长江口善海指挥,出现在福州南台大桥头及其附近一带,伺机行凶。下午 5 时左右,“青年会”学校、马江海军学校学生及育德学校教员等五六人经过大桥头。日本暴徒一拥而上,刀棍齐下,手枪乱射,连赶来劝阻的中国值班警察和过路市民也不能幸免,受害者达 10 多人。其中有的脚部中弹骨碎,有的子弹穿透肋骨,均不省人事,有的被刀棍重伤,头破血流。警察史孝亮被手枪击中胸、腹四处,虽经医院抢救,但终于因伤重毙命。中国警察虽然奉命‘和平弹压’而不敢开枪还击,还被抢

去马枪两支，但仍将凶手日本人福田源藏擒获，并收缴手枪一支。与此同时，田垱一带也发生日本暴徒闹事行凶。当时，一群日本暴徒在江口善海的带领下，闯入顺记洋菜馆，一直跑到楼上。过路的市民不明真相聚集围观，日本暴徒即在楼上熄灭电灯，把酒瓶、罐头、汽水瓶及痰盂、花盆等纷纷掷下，并开枪射击围观者，市民被打伤多人。中国警察赶到后，当场擒获开枪凶手两人，并缴获左轮手枪一支，匕首一把；同时查明在楼上开枪、掷物的是江口善海等七人，而顺记洋菜馆损失达 3 000 余元。随即，日本总领事馆派人到福州警察署要求根据“领事裁判权”将在大桥、田垱闹事的两批凶犯领回，福建当局只得同意。这就是当时被全国各地称之为“闽案”的“台江事件”。

事件发生后，日本总领事馆又捏造事实，照会福建政府，提出流血惨剧是因为中国学生违法截夺日商天田洋行运输中的货物，与日本人大起冲突而发生的。同时，日本暴徒气焰十分嚣张，连日到处追打中国学生，使福州台江一带一时成为恐怖地区。

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福建人民的义愤。17 日，福州各校学生全体罢课，城内城外商店一律罢市；下午，福建学生联合会发起在省议会前召开临时国民大会，工、农、商、学各界与会者一万余人。大会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向日本政府交涉；撤换日本驻闽领事，新领事来闽应向中国福建地方政府道歉；赔偿一切死伤损失；由中日司法官员会审滋事祸首以及被中国福建政府当场拘捕的凶手，并严加惩办；同时要求允许学生正当自卫。福建学生联合会还致电全国各界联合会，请求支援福州人民的爱国反日斗争。此外，福建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交涉署也针对日本总领事馆的“照会”，据理驳斥，指出：“当日流血之事实，……系贵国人及贵国籍民等预先排布持械行凶，演成流血所不可掩之事实。”

“台江事件”的消息传布省内各地后，各市、县人民群众也纷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